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Russia: Historical Evolu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Resource Building

Wei Lu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College, Xi'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00, Chian

Abstract

Taking Chinese education in Russi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uses historical analysis,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sort out the three-stage development process: the foundation of Sinology in the Tsarist Russia period, the tortuous developmen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ideology in the Soviet period, and the diversified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in the contemporary period. It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 laws of each period. It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being included in the Russia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explains the 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al distribution differences of basic education, higher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upplementary education outside the system, and highlights its core feature of "strong state dependence". It examines resource construction from four dimensions: teacher teams, textbook construction, examin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social publicity, identifies structural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cy and financial support, poor connection 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lack of standards and norms, and lagging "three-teaching" (teachers, textbooks, teaching methods) construc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optimization strategies.

Keywords

Russia; Chinese Educ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N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Resource Construction

俄罗斯中文教育发展研究：历史演进、体系构建与资源建设

罗薇

西安外事学院国际合作学院，中国·陕西 西安 710000

摘要

以俄罗斯中文教育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分析法、文献研究法与比较研究法，梳理其发展三阶段脉络：帝俄时期汉学奠基、苏联时期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曲折发展、当代多元化战略转型，明晰各时期发展特征与演进规律。系统分析中文纳入俄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阐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体系外补充教育的阶段特点与区域分布差异，凸显其“强国国家依附性”核心特征。从师资队伍、教材建设、考试评价、社会宣传四维度展开资源建设考察，识别出政策财政支持不足、各学段衔接不畅、标准规范缺失及“三教”（教师、教材、教法）建设滞后等结构性短板，并针对性提出优化对策。

关键词

俄罗斯；中文教育；历史演进；国民教育体系；资源建设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专项2025年度“人工智能与全球中文教育创新发展专项课题”研究项目“区域国别中文教育发展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25HZ1339）；2025年度陕西省西安外事学院“一带一路”国际陆港物流联合研究中心项目“‘一带一路’沿线俄语国家中文教育政策比较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GH202513）。

【作者简介】罗薇（1992-），女，中国甘肃白银人，博士，讲师，从事俄国汉学，俄罗斯中文教育，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1 引言

中俄友好交往历史悠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俄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守望相助的好朋友、精诚协作的好伙伴。俄罗斯中文教育作为国际中文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历程跨越三个多世纪，见证了中俄关系的起伏变迁与文化交流的绵延流长。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合作日益密切。在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背景下，俄罗斯中文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梳理俄罗斯中文教育的历史演进脉络，通过与他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比较分析，深入分析中文纳入俄罗斯

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与特点，横向考察教育资源系统建设水平，分析其中的问题与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对策与未来展望，以期对俄罗斯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2 研究现状与问题梳理

俄罗斯中文教育研究主要包括中文教育史研究、中文人才培养研究和“三教”问题研究。中俄两国学者聚焦俄罗斯中文教学现状、问题及策略，进行个案与宏观研究，及汉字、词汇、语法、口语、阅读等教学实践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现有研究的理论框架主要采用区域国别研究、多元智能理论、跨文化交际理论等。研究方法包括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课堂观察法、统计分析法、案例分析法等多种方法。现有关于俄罗斯中文教育的研究主要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文教育史研究起步早，内容较丰富。俄罗斯中文教育史研究从18世纪初的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开始，经历了帝俄时期、苏联时期和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阶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历史脉络。不足在于对各个发展阶段之间的演进特征及关联规律挖掘不足。第二，中文人才培养研究起步晚，数据翔实。研究涵盖俄罗斯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社会培训机构等多个层面。不足在于个案研究较多，较少涉及整体发展的系统分析及学段衔接问题。第三，“三教”问题研究视角广，成果丰硕。在师资研究方面，重点关注了本土教师培养、中方教师派遣、志愿者服务等问题；在教材研究方面，梳理俄罗斯本土中文教材的编写历程和使用情况；在教法研究方面，探讨适合俄罗斯学习者特点的教学方法和模式。已有成果的研究对象主要以课程、师资、教材、教法、孔子学院等为研究对象的本国内部问题研究，基于国际比较视角的研究较少。

基于上述，本研究提出以下核心问题：第一，俄罗斯中文教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怎样的发展特征和演进规律？第二，中文如何逐步纳入当代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其在不同教育层次的发展现状如何？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何特色？第三，俄罗斯中文教育资源系统建设的现状如何？第四，俄罗斯中文教育发展面临哪些主要问题，应采取哪些对策，未来发展趋势如何？本研究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为俄罗斯中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

3 俄罗斯中文教育的历史分期考察

俄罗斯中文教育史的发展与俄罗斯国家历史的变迁、中俄两国外交关系变化、汉语语言文字本身的近代化发展等因素紧密相关。据此可划分为三个重要时期：传统汉学逐步奠基的沙皇俄国时期（18世纪初-1917年）、意识形态下曲折发展的苏联时期（1917-1991年）、以多元化发展与战略转型为特点的当代俄罗斯时期（1992年至今）。

3.1 帝俄时期（18世纪初-1917年）：传统汉学奠基期

俄罗斯中文教育的历史可追溯至18世纪初，其正式开端是1727年俄国政府首次派遣留学生随东正教驻京传教士团赴华学习汉语，揭开了近代欧洲国家留学中国的序幕。19世纪是俄罗斯中文教育的关键发展期，涌现出多个里程碑式机构与人物。1835年，恰克图成立俄境内第一所中文专科学校，创始人、俄罗斯汉学奠基人比丘林编写《汉文启蒙》，奠定本土汉语教育基础；1837年，喀山大学设立欧洲首个汉语教研室，教席西维洛夫制定俄首部《汉语教学大纲》，标志汉学课程进入高等教育系统；1855年，彼得堡国立大学成立汉语教研室，首任主任瓦西里耶夫创立彼得堡汉学派，其《汉字分析》成为经典教材，首创的笔画检字系统沿用至今。1899年，海参崴东方学院成立，专门培养远东地区翻译人才，施密特编写的《汉语官话语法试编》成为第一部高校专用语法教材，1899-1911年间共培养120余名俄汉翻译。

帝俄时期的中文教育具有以下特点：第一，由初期传教士汉学逐步转向专业汉学发展：早期获取中文教育的渠道单一，依赖于东正教组织，后期随着一代代传教士汉学家的积累，逐步建立起脱离宗教组织的专业教育及学术体系。第二，由初期赴华留学逐步转向本土发展：俄罗斯汉学虽脱胎于东正教驻京使团，但后期因其科学院和教育部的支持，本土高校专业教研室持续发展完善，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中文人才；第三，由彼得堡学派古文经典研究孕育出后期的海参崴新实用主义学派：随着中俄两国关系的变化以及俄国对远东局势的需求，伴随着中文自身由文言文向现代汉语转化的进程，俄罗斯中文教育也从古文经典为主逐渐重视实用主义和官话汉语口语。第四，政府主导：从留学生选派到教育机构设立，从教材编写、教师培养及高校设立都由俄国政府直接主导和资助。第五，精英教育：接受中文教育的主要是来自神学院和高等院校的学生，属于精英教育范畴。

3.2 苏联时期（1917-1991年）：意识形态下的曲折发展

苏联时期的中文教育经历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可划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1917-1945）为初创期，1920年列宁签署命令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组建现代东方语学院，莫斯科东方学院成为苏联首个汉语教学机构。1921年成立全俄东方学术研究会，创办《中国问题》《革命的东方》等专业学术刊物。1930年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成立，成为汉学研究的重要基地。第三阶段（1946-1965）为蓬勃发展期，1956年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秘密决议，决定组建苏联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旨在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和经验。期间，苏联有近800名从事汉学研究的学者，出版了近千种书籍，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期。在中文教育领域出现了米亚斯尼科夫、龙果夫、康拉德等中文研究

的专家学者。第四阶段（1966-1991）为停滞期，由于中苏两国意识形态分歧，中文教育进入低谷。

苏联中文教育具有鲜明特点，核心成果与局限并存，对中俄交流及后续汉学发展影响深远。其首要特点是“大”，由政府主导构建了完备的中文教育与汉学研究体系：既继承帝俄汉学遗产，又新建多个核心机构，莫斯科大学东方语言学院、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列宁格勒大学东方系、远东国立大学成为关键教育基地，机构完备、研究实力雄厚。其次是“全”与“专”，教育从语言教学拓展为涵盖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经济等多学科的综合体系，汉学家均受良好学术训练，深耕特定领域，为苏联培养了大批汉学人才，推动中俄文化交流。教学上采用自觉对比教学法，以语言知识及理论为重点，通过长期大量练习培养汉语思维，借助母语辅助教学，以文字材料和文学语言为核心教材。此外，其教育带有明显意识形态主导倾向，与西方汉学交流不足，局限了学术影响，但苏联汉学成果远超帝俄时期，为日后俄罗斯汉学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3.3 当代俄罗斯（1991年至今）：多元化发展与战略转型

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中文教育摆脱意识形态束缚，在中俄关系深化背景下，形成“政府引导、高校主导、社会参与、中俄协作”的多元化格局，其发展与俄外交取向、中俄合作需求深度绑定，逐步构建多层次全覆盖体系，历经三阶段演进：第一阶段（1991-2000）为复苏探索期。教育体系重构与财政短缺导致中文教育低迷，仅莫斯科大学等传统汉学重镇保留中文专业，规模收缩。此阶段中文教育回归语言工具性，聚焦中俄边境贸易等实用领域，完成单一导向突破。第二阶段（2001-2010）为稳步发展期。2001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后，中文教育获政策支持；2005年首所孔子学院成立，高校招生规模扩大，远东等边境地区中小学开设中文兴趣课，地域覆盖突破核心区。第三阶段（2011年至今）为战略提升期。“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俄关系升级凸显中文价值，2020年纳入中小学必修/选修目录。中文教育层次完善，基础教育、高校“本-硕-博”体系、职业教育“中文+X”及社会培训协同发展，形成全覆盖格局。

当代俄罗斯中文教育承袭帝俄汉学遗产与苏联系统化教育体系，以“多元化”与“战略转型”为核心，形成六大鲜明特征，与前两个历史时期形成显著分野。在发展导向层面，突破帝俄窄域实用主义与苏联意识形态主导的局限，构建国家战略与经贸、文旅等市场需求的双轮驱动模式；在办学主体层面，打破前两时期政府单一主导格局，形成“政府定政策、高校建体系、社会补短板、两国互协同”的多元共治生态，联邦教育部制定标准，高校承担人才培养与汉学研究核心任务，社会机构满足大众需求，孔子学院成为中俄合作核心平台，中方提供师资、教材等支持；在教育体系层面，升级为“中小学启蒙-高校专业-职业应用-社会补充”

的多层次全覆盖国民教育体系，兼顾精英培养与普及教育，弥补帝俄精英教育、苏联侧重高校专业而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空白的短板；在办学模式层面，实现本土传承与国际融合双线并行，破解帝俄本土体系初级化、苏联封闭发展的困境；在学科体系层面，迈向学术与应用双轨发展，高校汉学研究聚焦中俄关系等前沿领域，语言教学转向应用化、跨学科化，开设“中文+”复合型专业，化解学术与应用脱节问题；在教学方法与资源层面，引入情景、任务型等多样化教学方法，资源建设形成“本土编写-引进改编”双轨模式，推广HSK考试并丰富线上数字化资源，实现共建共享与个性化供给，改善帝俄未系统化、苏联形式单一的状况。综上，当代俄罗斯中文教育通过六大维度转型，构建起适配时代需求的现代化体系，这是俄罗斯国家战略调整、中俄关系深化等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实现了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有机统一，为当代中俄语言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中文纳入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考察

当代俄罗斯的国民教育体系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类：普通教育分为初等普通教育（小学一至四年级）、基础普通教育（初中五至九年级）和中等普通教育（高中十年级、十一年级）三个阶段；职业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高校后及补充职业教育五个层次（刘家宁、李宝贵，2022）。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外语教育占据重要地位。中文近年来发展前景广阔。俄罗斯的高校中文教育拥有悠久历史，体系完善，实力雄厚；近年来，中小学中文教育的发展态势引人注目，职业中文教育也开始萌芽。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孔子学院、培训机构、华文学校等也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4.1 中文在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发展

俄罗斯通过持续完善外语教育政策，为中文教育发展筑牢制度基础。其外语教育政策遵循语言平等理念，支持双语及多语教育发展，自1994年起陆续颁布《联邦普通教育国家标准》《关于普通基础教育阶段将第二外语作为必修课的函》等系列官方文件，持续优化外语教育体系。2019年新版《普通教育联邦国家标准》将第一、第二外语列为基础教育必修课，中文同年纳入国家统一考试（ЕГЭ）选考科目，成为第五大可选外语，标志着中文教育获得国家教育体系正式认可，实现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2020年修订版《国家标准》进一步将中文纳入中小学外语必修或选修目录，以顶层设计推动中文普及。2020-2022年外语教育改革调整课程与考试定位，外语保留必修地位但不再必考，第二外语由必修转为选修。整体而言，俄罗斯宽松多元的政策环境为中文教育拓展了发展空间。

在政策驱动下，俄罗斯基础教育中文教育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学习者规模持续扩容，据俄罗斯教育部数据，2015年基础教育阶段中文学习者仅4400人，2018年增至

1.7万人,2021年实现规模翻倍,2023年已达5.3万人,较2015年增长12倍,保持高速增长势头。开设中文课程的学校数量大幅提升,2018年全国仅168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覆盖34个联邦主体,至2024年已跃升至500余所,数量增长三倍。地区分布上形成三大核心区域:远东地区普及率最高,海参崴70%的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等毗邻中国的地区更将中文列为必修课;莫斯科地区中文受欢迎度较高,70多所学校的近8000名中小学生参与中文学习;圣彼得堡、伊尔库茨克等其他主要城市也纷纷开设中文课程,中文教育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未来,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框架下,中文教育将向规范化、规模化进一步推进,成为基础外语教育的核心增长点。此外,2017年俄罗斯首次制定五年级以上中文作为第二外语的教学大纲,明确十一年级毕业生需具备正式与非正式场景对话、文本阅读、书信写作等能力,为中文教学系统化奠定基础。

俄罗斯基础教育中文教育的核心特征显著:其一,政策驱动性突出,政策体系从“准入”向“提质”逐步完善,成为核心发展动力;其二,区域发展不均衡,远东边境及核心城市覆盖率超35%,内陆偏远地区不足10%;其三,中俄协作融合,形成“俄方主导、中方协作”的良性模式;其四,教学形式多样化,融合传统课堂、远程互动、AI辅助教学与文化实践,兼顾语言技能与文化认知;其五,功能定位实用化,高年级课程对接国家统考与HSK考试,融入商务对话、边境贸易沟通等实用内容,贴合中俄合作现实需求。不过,作为新兴语种,中文教育仍存在短板:课时占比小、混班教学多、课型设置单一、文化与实践活动占比低、缺乏统一汉语水平测试、多用本土自编教材等,相关问题需在发展中逐步完善。

4.2 中文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发展

4.2.1 政策背景与发展概况

当代俄罗斯高等教育中文教育已进入从“小众学术研究”到“国家战略推广”的深度转型期,其发展轨迹与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深化同频共振,政策层面形成了多层次、系统化的支撑体系:2000年制定《非语言专业高校外语课程示范教学大纲》,倡导多元化外语教育原则;2018年俄罗斯联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将中文列为“保障国家利益的优先发展外语”,明确其战略地位;2020年修订的《国家教育标准》进一步完善中文课程体系;2025年中俄元首宣布2026-2027年为“中俄教育年”,为中文教育深化注入新动力。

在此背景下,俄罗斯高等院校的中文教育紧扣国家“向东看”战略,深度绑定中俄经贸合作、远东开发、“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形成政策与市场需求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从地区分布来看,整体呈差异化定位: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核心城市高校侧重学术研究与高端人才培养,远东地

区高校聚焦边境贸易实用人才培养,内陆地区高校则以公共课和第二外语为主,逐步拓展专业教育。发展规模实现爆发式增长,1997年仅18所高校开设中文,2025年已突破200所(占全俄高校总数20%),大学生中文学习者从2022年2.2万人增长至2025年约3.5万人,年均增长率达18%。从发展趋势上看,正从“语言技能培养”向“战略人才培养”升级,形成三大核心方向:一是“中文+专业”复合人才培养模式兴起,142所高校开设汉语专业,26所高校设立覆盖经贸、法律、工程等领域的双学位项目,俄石油、俄钢铁等巨头还与高校共建定向班;二是联合培养模式创新,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专业人才”计划为远东高校追加35%汉语教育拨款,试点“3年国内学习+1年中国实践”的“3+1”模式,两国共建立15所高校联盟,覆盖800余所高校,联合培养项目达267个;三是理工高校中文教学加速发展,莫斯科物理技术学院等顶尖理工学院将中文列为必修外语,中俄合办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将“中文+理工类”专业列为办学特色,其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中文技术文献的能力,适配中俄未来科技领域合作需求。

4.2.2 中文专业课程开设情况

俄罗斯高等教育中文专业已形成学术研究兼职业应用的双轨格局。在学术领域,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传统汉学重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占全国汉学研究人员60%,在《俄罗斯东方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年均超500篇;在职业领域,毕业生就业率达92%,其中35%进入中资企业,28%进入俄驻华机构,15%从事汉语教学工作,14%进入政府部门负责中俄合作事务。每年从各大高校毕业的中文专业学生约3000人,其中10%-20%成为精通中文、对中国当代发展有深入研究的专业人才。截至2025年,俄罗斯共有142所高校开设中文专业,形成以莫斯科、圣彼得堡、远东为核心的三大汉学教育集群。本科阶段侧重语言基础与专业入门,硕士阶段侧重研究能力培养,博士阶段聚焦前沿问题研究,形成完整的能力培养链条,注重语言应用能力培养,85%的高校中文课程包含实践环节,如中国企业实习、跨境交流活动、文化体验项目等,部分高校与中资企业共建实践基地。专业设置分为三大类:一是传统汉学专业,以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系为代表,培养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研究型人才;二是“中文+专业”复合专业,如“中文+经贸”“中文+法律”“中文+工程”等,占双学位项目总数的70%,如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开设的“中文+国际关系”、圣彼得堡国立经济大学“中文+国际贸易”、远东联邦大学“中文+能源经济”专业等,将中文语言能力培养与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培养复合型双语人才;三是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如“当代中国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中俄关系研究”等,侧重培养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专业人才。

俄罗斯高校中文课程体系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特

点,主要包括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项技能课程、文化拓展课程以及 HSK 专训课程等。基础课程针对低年级学生,包括基础汉语、汉语语音、汉语语法等,旨在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语言基础。专业核心课程是随着学生水平的增长有计划地开设汉语精读、汉语泛读、汉语听力、汉语口语、汉语写作、汉语翻译等专业课程。技能专项课程包括商务汉语、法律汉语、旅游汉语等应用型课程,满足不同专业的学生需求。文化拓展课程则涵盖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经济等多种领域,多为选修课程。HSK 专训课程是针对汉语水平考试(HSK)的应试辅导课程,帮助学生提高考试成绩。以顶尖高校为例,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作为俄罗斯汉学的传统高地,拥有完整的中文教育体系,其东方系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核心机构。该校中文教育呈现三大特色。首先是多层次培养体系:开设从本科到博士的完整中文教育课程,涵盖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等领域,有大约 60 个中文学习项目;二是跨学科融合:2016 年首次开设中国方向的法律专业,硕士阶段在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专业均设有中国方向,2025 年又推出“经济学(中国经济与语言高级研究)”本科项目;三是中俄深度协作:2007 年成立的孔子学院已培养近 4000 名学生,举办文化活动近 200 次,受众人次达 12 万人,2010 年荣获“先进孔子学院奖”。

4.2.3 中文公共课、第二外语开设情况

中文公共课与第二外语教学是俄罗斯高等教育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呈现“普及化、常态化”发展态势。截至 2025 年,全俄有 200 余所高校开设中文公共课或第二外语课程,其中 50 所高校将中文列为必修公共课,学习人数约 8000 人,面向如国际关系、经贸等特定专业的学生开设;150 所列为选修公共课,面向全体学生开放,进行学分制管理。研修中文公共课的学生规模达 1.8 万人,占高校中文学习者总数的 51%,较 2020 年增长 80%。俄罗斯高校中文公共课与第二外语教学效果显著:一是应用能力增强,80% 的学习者表示能够在日常交流和特定场景中使用中文。二是跨文化理解加深,92% 的学习者认为中文学习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三是 HSK 通过率稳步提升,2025 年全国高校公共课学生 HSK4 级通过率达 65%,较 2020 年提升 20 个百分点。喀山联邦大学现有约 1000 名本校学生学习中文,其中 60% 是公共课或第二外语学习者。学校开发的“对比教学法”证明,俄罗斯学生平均只需 600 学时即可通过 HSK4 级考试,效率较欧美学生高出 20%。

4.4 中文在职业教育体系中的探索

职业中文教育是俄罗斯中文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相比中小学和高等教育,其发展相对滞后。目前,俄罗斯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中文教育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需求增长迅速。俄罗斯对某些特定职业具备中文素质人员的需求增长了 1.6 倍以上,不仅涉及翻译、导游、教师、工程师等

传统职业范围,甚至会计、厨师、油漆工、网络主播、推土机操作员等也逐渐需要学习中文。多元化的需求为职业中文教育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第二,培养模式多样化。俄罗斯正在探索“职业+中文”的教育模式,根据各领域的中文人才需求定向培养专门用途类中文教师,为俄罗斯的职业中文教育储备师资力量。第三,线上中文职业教育培养模式逐渐受到重视,2022 年“俄罗斯商务中文人才线上培育专项”通过物流中文、科技中文、中俄贸易等系列课程,培养“懂商务、通中文、知中国”的俄罗斯经贸人才;第四,校企合作初见成效。一些企业与教育机构合作,结合市场导向,有针对性地“订单式”培养“职业+中文”专业人才。企业专业人员辅助高校开展职业中文教育,缓解师资短缺问题;为高校在校生提供实习实践机会,引导学生“做中学,学中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为高年级学生提供实习和对接就业岗位,解决学生实习、就业问题。第五,区域发展不平衡。以阿穆尔州为例,该州目前仅有两所高校开设系统性汉语课程,年培养中文人才不足百人,而企业对复合型人才(通晓法律、贸易的专业翻译)的需求缺口高达 78%。这种巨大的供需缺口反映了职业中文教育发展的不足。

4.5 国民教育体系外的中文教育补充

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俄罗斯还存在其他补充机构:孔子学院、社会培训机构、华文学校等多元主体共同构成了社会中文教育的供给体系,满足了不同群体的学习需求,为俄罗斯中文教育发展的国民化普及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

孔子学院是俄罗斯中文教育的重要补充力量。作为中俄教育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孔子学院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截至 2025 年,俄罗斯共建立 19 所孔子学院、5 个孔子课堂,大部分均在正常运营状态,是世界上拥有孔子学院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覆盖莫斯科、圣彼得堡、叶卡捷琳堡等 17 个城市,成为俄罗斯中文教育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目前在册孔子学院分布如表所示:

2006	远东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黑龙江大学 圣彼得堡大学孔子学院 - 首都师范大学
2007	国立人文大学孔子学院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新西伯利亚国立技术大学孔子学院 - 大连外国语学院 伊尔库茨克大学孔子学院 - 辽宁大学 喀山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湖南师范大学 布里亚特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长春理工大学 卡尔梅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内蒙古大学 托木斯克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沈阳理工大学
2008	莫斯科大学孔子学院 - 北京大学 乌拉尔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新疆大学
2010	梁赞国立大学孔子学院 - 长春大学 阿穆尔国立人文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 哈尔滨师范大学 伏尔加格勒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 天津外国语学院
2011	莫斯科国立语言大学孔子学院 - 北京外国语学院
2017	布拉戈维申斯克国立师范大学孔子学院 - 黑河学院

莫斯科大学语言大学孔子学院是俄罗斯孔子学院发展

的典型代表,该学院于2011与北京外国语大学合作建设,历经十余年发展已成为欧洲最大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获评首批“全球HSK示范考点”,注册人数从建院初期的每年数十人增至千人,学员涵盖大学生、职场人士及社会爱好者,开设综合汉语、商务汉语、HSK辅导等多样课程。俄罗斯孔子学院普遍采用中俄高校共建共管、资金共担的机制,数量较多但分布不均,主要集中在西部经济发达地区,课程设置因地制宜、类型丰富,学员以大学生为主,师资由本土教师与中方“输入型”教师构成且数量基本持平,志愿者教师流动性较大,教材多采用中方通用类,本土教材建设取得一定进展,文化活动场次多、受众广且形式多样。其核心功能包括开展成人及少儿汉语培训、配合高校开设二外中文选修课、储备中文师资、承办HSK考试、管理赠书图书馆、组织各类赛事会议及面向民众开展中国文化体验活动等,不仅在语言教学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更通过“汉语桥”比赛、中国文化节、书法展览等活动推动中国文化在俄传播,同时在教师培训、教材开发、学术研究等领域持续发力,为俄罗斯中文教育的整体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俄罗斯的中文培训机构是中文教育体系的重要补充。中文培训机构形式多元,涵盖专业语言学校、私人补习班、在线教育平台等,核心优势在于灵活性与针对性,能精准满足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学习需求。从地域分布来看,机构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这些地区人口密集、中俄经贸往来频繁,对中文人才的需求旺盛,为机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近年来,培训机构的数量与学员规模均呈快速增长态势,仅莫斯科就有百余所私立中小学及课外补习班开设中文课程。此外,在线教育培训的发展尤为突出,俄罗斯电子学校推出多节在线中文课程,形成完整教育链条,课程涵盖口语实景训练、文化云端讲座、线上互动游戏等多元模块,通过趣味与实用结合的方式激发学习兴趣。在培训内容上,机构呈现多样化与专业化特征,除常规语言培训外,还针对性推出商务汉语、旅游汉语、HSK考级培训等专业课程,部分大型语言培训机构的中文报名热度持续攀升,彰显其作为中文教育重要力量的地位。

华文学校是俄罗斯中文教育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俄罗斯是非传统移民国家,常住中国移民及其后代数量有限,华文学校自2010年前后萌芽发展,主要服务于移民子女,学员规模未实现突破性增长,与欧美移民国家华文学校存在一定差距。为谋求生存与发展,华文学校摸索出独特模式:一是集中布局于移民聚集的大城市,契合供需匹配需求;二是推动教师、教材、生源等教学元素多元化发展,增强适应性;三是创新整合资源,通过与当地中资企业合作、联合国国内教育集团办学、开发特色课程或转型为独立孔子课堂等方式拓展发展空间。圣彼得堡“孔子”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典型代表,该校2001年由华侨创办,是俄罗斯首个华侨经营管理的华文学校,2007年转型为独立孔子课堂,同时整合

当地政府资源,取得法人资质及“永久教育许可证”,为华文学校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成功范例。

4.6 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际比较

在欧美地区,中文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法国的中文教育历史悠久,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欧洲重要的中文教育中心。法国中文教育体系相对完善,从中学到大学都有完善的大纲体系和课程体系。德国的中文教育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领域,中文教育注重学术研究,培养了大量汉学专家。英国的中文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许多中学开始开设中文课程,一些大学还设立了“中文+”的联合学位项目。美国的中文教育体系庞大,包括公立、私立、周末学校等多种形式。美国的“关键语言战略”将中文列为关键语言,在K-12教育中推广中文教育,并将中文列入AP课程,建立完善的中文教师培养体系和本土中文水平认证体系。然而,除法国之外,多数欧美国家的中文教育多为学校自主开设的兴趣选修课,缺乏国家统一规划与政策支撑,发展动力源于多元文化需求与民间交流,整体呈低速发展或下滑态势,布局零散且无系统培养体系,中外协作仅为补充性资源支持。与这些欧美国家相比,俄罗斯地理位置邻近中国,具有天然地理优势;中俄关系密切,为中文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在制度保障方面走在欧洲前列,以国家“向东看”战略与中俄务实合作为核心驱动力,通过顶层政策设计完成系统性布局;教育体系集中,便于统一管理和协调,逐步形成核心城市与远东边境双核心发展格局;在孔子学院、学历互认、联合办学方面与中国的合作更加深入。在这一优势背景下,俄罗斯中文学生规模爆发式增长,居全球领先地位,迎来发展黄金时期。

以高等教育为例,俄罗斯与美、法、英、德等欧美国家的高等院校中文教育均依托各类资源平台推进中文教学及跨文化交流,但在政策支撑、发展进度、核心驱动、课程方向上存在显著区别。俄罗斯的中文教育由国家顶层统筹规划,全国百余所高校开设相关专业,2017-2025年学生规模增长100%、年均增长率达18%,大规模增幅源于国家战略与中俄务实合作需求,必修与选修结合,课程侧重专业及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理工高校中文发展趋势明显;而美、法、英、德等欧美国家的中文教育多为高校自主布局,缺乏国家层面统一规划,开设中文专业的高校不足100所,年均增长率不足5%,以多元化教育与学术研究需求为核心动力,以兴趣选修为主,课程更侧重文史哲学类学术研究。基于依附理论,俄罗斯中文教育呈现“强国家依附性”特征,其政策制定、资源分配、人才培养与中俄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需求深度绑定,教育体系的自主性较弱;而欧美国家的中文教育表现出“市场化自主性”,高校主导课程设计与资源调配,受市场需求与学术研究导向驱动,国家层面的统筹干预相对有限。基于圈层理论,中俄“战略协作圈层”决定了俄罗斯中文教育以“政策驱动-工具应用”为核心传播路径,侧重

服务双边政治经济合作；而欧美“多元文化圈层”则推动其中文教育以“学术引领-文化阐释”为传播路径，侧重语言文学研究与跨文化对话。

5 俄罗斯中文教育资源系统建设的多维考察

中文教育资源的系统建设是衡量一个国家中文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具体包括中文的师资建设、教材建设、考试建设以及社会宣传建设等。

5.1 中文师资建设

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师培养历史悠久，与中国合作密切并获得公派教师及志愿者的支持，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教师培训体系。但是培养规模相对较小，难以满足快速增长的教学需求，缺乏统一的本土教师认证标准和质量评估体系。

根据往期统计数据，2008-2009 学年，俄罗斯开设中文课程的高校有 138 所，学习者 14,726 人，中文教师 693 名，其中本土教师 574 名，中国籍教师 119 名，师生比为 1:21。截至 2017 年，俄罗斯开设中文专业及课程的高校 179 所，学生 2.2 万名，中文教师 800 余人，师生比为 1:28。从师资结构来看，俄罗斯中文教师队伍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本土教师占主体。本土教师数量约占 70%，中国籍教师约占 30%。第二、分布极不均衡：大部分中文教师集中在远东、西伯利亚、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等中文教学历史悠久的地区和城市，而其他地区中文教师缺口较大。第三、高水平院校师资相对充足：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35 名）、高等经济大学（31 名）、伊尔库茨克国立大学（24 名）、圣彼得堡国立大学（21 名）、远东联邦大学（20 名）、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19 名）、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16 名）等学校拥有较多的中文教师，而大部分学校师资薄弱，个别学校仅一两名中文教师。

俄罗斯中文师资培养体系有三个层次。首先是高等院校培养：主要高等院校通过本科、硕士、博士等学位教育培养中文教师。例如，莫斯科国立大学、圣彼得堡国立大学等传统汉学强校，以及新成立的中俄联合大学如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等，都承担着培养中文教师的任务。其次是在职培训体系：通过定期的教师培训、研讨会、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在职教师的专业水平。例如，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新西伯利亚国立大学教师培训学院、中国新疆大学联合举办的培训项目，共有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 4 个国家，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等 31 个城市的 90 余名教师参加。最后是联合培养模式：中俄双方正在探索联合培养师资的新模式。计划在中俄教育类高校联盟的框架下，由中俄双方联合建立集学历教育与教师培训为一体的中俄中文师范大学，选址俄罗斯，主要招收普通教育阶段学习中文的毕业生，专门联合培养高质量、热爱并乐于从事国际中文教育相关职业的中文师资与新汉学研究者。

5.2 中文教材建设

俄罗斯中文教材建设具有悠久历史和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当代俄罗斯本土中文教材建设取得了丰硕成果。通过网络查询，共收集俄罗斯出版的本土中文教材 453 部，其中当代本土中文教材 441 部。这些教材按照类型包括课本、教辅、工具书、考试用书、读物，课本和教辅居多，工具书次之；按照学习者水平包括初级教材、中级教材和高级教材，初级教材居多，中级教材次之，高级教材最少；按照技能类别包括综合类、听力类、口语类、阅读类、写作类和翻译类，综合类教材最多。俄罗斯中文教材的本土化程度较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是编写主体本土化：主要由俄罗斯本土专家编写或中俄专家合作编写，而非简单翻译中国教材。其次是内容设计本土化：教材内容充分考虑俄罗斯学习者的特点和需求，针对俄语背景学习者的语音难点设计专门的发音练习、结合俄罗斯文化背景解释中国文化现象、使用俄罗斯学生熟悉的生活场景和话题等。第三是教学方法本土化：教材编写体现了俄罗斯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强调语法规则的系统学习和大量的语言练习。最后是出版发行本土化：在俄罗斯国内出版社出版发行，便于教材推广和使用。

在基础教育阶段，俄罗斯普通教育机构主要选用《俄罗斯联邦普通教育阶段推荐教材目录》推荐的中文教材和联邦教育国家标准系列中文教材，例如：《汉语》（Руководникова М.В. 等）、《汉语》（Сизова А.А. 等）、《汉语》（Рахимбекова Л.Ш. 等）、《汉语》（Ольга А.М. 等），此类多为系列教材（包括课本、练习册、教师用书、字帖、测试等），符合《俄罗斯联邦普通基础教育国家标准》和《5-9 年级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大纲》规定的普通教育机构中文课程每周 2 课时、每学年 70 课时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的教材选用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教师通常自主选择俄罗斯本土中文教材，辅以中国出版的中文教材和自编教材。《实用汉语教科书》（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А.Ф. 等）是俄罗斯使用范围最广、人数最多、最受欢迎的一套中文教材，大部分高校选用《实用汉语教科书》来进行基础中文的教学。该套教材共两册，由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的中文专家 Кондрашевский А.Ф. 在《实用汉语课本》的基础上改编而成。该套教材自 1996 年初次出版发行到现在已经由不同的出版社连续出版 12 次，改编后的教材更适用于俄罗斯教育环境下的中文教学。其他重要教材还有《汉语入门》（Задаенко Т.П. 等）、《实用汉语语法》（Горюнов В.Н.）、《汉俄军事翻译教程》（Хабаров А.А.）等。

5.3 中文考试建设

中文考试建设是推动俄罗斯国际中文教育规范化发展的重要保障，主要涵盖本土国家统一考试、HSK 国际考试及补充考试三大体系，兼具鲜明特点与待完善之处。2019 年，俄罗斯实现中文教育历史性突破，将中文正式纳入国家

统一考试(ЕГЭ),从制度上确立了中文的地位,在欧洲国家中处于领先水平。该考试采用笔试与口试相结合的形式:笔试涵盖听力、阅读、语法词汇、写作等模块,口试则考查发音与口语表达。此后,中文报考人数逐年增长,考点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成为支撑中文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内良性发展的重要导向。与此同时,俄罗斯积极推广国际汉语水平考试(HSK),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新西伯利亚等主要城市广泛设立考点,推广成效显著,中小學生报考占比逐步提升,且正探索本土高考试题与HSK的对接路径,从测试评估层面推进教学统一化发展。补充考试系统也在不断完善,俄罗斯教育部组织中小学汉语奥林匹克竞赛,获胜者可获得中国留学奖学金,既检验了学生语言水平又激发了学习兴趣,部分高校将自主中文测试作为招生参考依据,导游、翻译等行业也已开始建立中文能力认证体系。俄罗斯中文考试建设具备显著优势:制度保障完善,以国家统一考试确立中文地位;考试形式科学,全面考查学生综合语言能力;激励机制有效,将考试成绩与大学录取、留学奖学金等挂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动力;国际合作深入,通过推广HSK等国际认证考试推动标准协同。但仍存在需要完善的问题:尽管已出台统一教学大纲,但各教学机构多自主安排学习进度与内容,导致高中与大学课程衔接脱节,学生中文基础和语言能力参差不齐;不同地区的考试组织能力存在明显差异,部分偏远地区在考试实施过程中面临技术与人员短缺的困境。

5.4 社会宣传建设

俄罗斯中文教育的社会宣传建设是提升中文影响力、营造学习氛围的重要手段,整体呈现积极发展态势。其宣传渠道多元发力,不仅通过《消息报》《俄罗斯报》《教育报》等主流媒体定期刊登中文教育发展、中国文化介绍类文章筑牢舆论基础,还借助互联网普及的契机,以社交媒体平台为核心载体推送海量中文学习与中国文化相关内容,助力民众多维度认知中国语言文化。同时,中俄双方持续举办“国家年”“语言年”等系列交流活动,“汉语桥”大中小学生中文比赛广受追捧,俄罗斯各大城市也定期开展中国文化节、电影周、图书展等活动,既为学习者搭建了展示平台,又以文化感染力激发了民众的学习热情,直接推动中文学习热潮。在这样的氛围下,宣传成效显著凸显,越来越多家长认可中文学习对孩子未来发展的价值并主动支持,新一代汉语学习者更呈现“去工具化”特征,83%的受访学生将“理解中国发展模式”列为核心学习动机,远超“就业需求”的67%,充分体现了宣传对学习认知的积极引导作用。

6 俄罗斯中文教育发展的的问题与对策

6.1 发展问题分析

当代俄罗斯中文教育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问题,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可持续发展。

6.1.1 政策支持与财政投入

俄罗斯中文教育在政策支持与财政支出领域存在的系统性失衡与结构性短板,严重制约了其规范化、规模化发展。政策层面,尽管俄罗斯已通过各项重大举措回应中俄合作中的语言人才需求,且有议员提议将中文列为学校必修课并计划2026年试点,但整体政策体系仍有显著缺陷:缺乏覆盖全学段的顶层设计与跨部门协同机制,联邦框架性政策与地方执行脱节,教育、外交、经贸等部门在人才培养中的职责划分模糊,导致政策落地碎片化;针对教材本土化适配、低龄师资培养、地区发展不平衡等核心痛点的专项政策供给不足,政策连贯性受行政调整影响,未形成长效保障机制,部分地区的创新举措也因缺乏全国性推广与标准规范难以形成示范效应。财政支出方面的问题更为突出:中文教育财政投入与人才需求严重不匹配,联邦预算侧重俄语海外推广,中文教育无独立专项预算,资金依附于综合外语教育经费,分配优先级远低于传统外语;财政资源地区分配极端不均,核心城市获更多支持,而阿穆尔州等远东地区虽面临78%的复合型汉语人才缺口,却因地方财政薄弱导致高校汉语教育拨款不足,年培养规模不足百人;同时支出结构失衡,侧重短期项目与硬件投入,对师资培训、教研、教材开发等可持续领域支持匮乏,部分学校中文教学高度依赖国际合作资源,本土财政支撑缺乏稳定性与独立性,难以应对持续增长的学习需求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要求。

6.1.2 学段衔接与标准规定

俄罗斯中文教育发展面临学段衔接不畅与教学大纲、考试标准缺乏统一规范两大系统性问题,二者相互交织,制约了中文教育的整体质量与可持续发展。在学段衔接层面,中小学与大学的衔接断层呈现多维度困境:学生汉语学习的认知起点差异显著,部分低龄深耕中文、部分中学才初次接触,导致大学新生汉语水平两极分化,大量学生需“基础回补”,既占用高校教学资源,又延缓专业能力培养;课程体系与教学目标明显错位,中小学聚焦基础语言知识与简单交际训练,大学需快速转向专业语言应用与学术研究能力培养,使得新生在语法建构、汉字书写等核心能力上存在短板,难以适应进阶要求;教学范式与评价体系转型跨度大,中小学直观模仿、单一评价的模式与大学自主探究、多元评价的逻辑形成反差,引发学生适应障碍与动力衰减;同时,中小学优质师资稀缺、大学与中小学缺乏教学协同,教材等资源未形成学段贯通体系,进一步阻碍了学习平稳过渡。

在教学大纲与考试标准统一化建设方面,长期存在制度性缺失与标准协同不足的困境。2017年俄罗斯首次出台中级义务教育阶段汉语教学大纲,填补了教学内容与进度自主规划的空白,但该大纲需兼顾本土与国际标准的协调,且缺乏小学至大学一体化设计,各学段教学目标未能形成层层递进的体系。考试标准多元并存且不协调问题更为突出:国家统考标准与高校入学要求、HSK标准存在差异,导致中

学备考与实际语言能力培养脱节；HSK 虽被部分学校作为教学目标，却与本土大纲及国家统考适配度不足；校内自主命题考试缺乏统一规范，评价结果可比性与公信力不足。此外，标准统一化滞后还体现在地区、校际差异及学段考试衔接不畅，部分高校需单独组织汉语入学测试，而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等国际规范的对接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形成成熟协同方案。

6.1.3 教师、教材、教法问题

俄罗斯中文师资队伍面临数量严重短缺、质量参差不齐、培养体系不健全的突出问题，成为制约中文教育发展的关键瓶颈。俄罗斯教育部估算，实现中文课程全覆盖需至少 2 万名合格中文教师，而目前全国持证教师仅约 5000 人，供需失衡在各地均较为明显，且师资增长幅度远低于学习者增长速度，2017 年中文教育师生比达 1:28，远高于高校平均 1:10 的水平。质量层面，部分教师缺乏系统专业训练，在语言能力、教学法应用、跨文化交际教学等核心素养上存在不足，本土教师多依赖传统语法翻译法，教法单一。同时，师资培养与认证体系不完善，中小学及偏远地区优质师资尤为匮乏，大学与中小学间缺乏师资协同交流机制，针对不同学段的专项培训供给不足，难以支撑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提升。

俄罗斯中文教材存在多重突出问题，本土化程度亟待完善，主要体现为类型失衡、内容陈旧、跨文化转化不足、质量参差、数字化程度低及学段衔接缺失。本土教材多集中于初级通用型，中高级及专门用途教材稀缺，难以覆盖全学段需求；部分教材内容过时，缺乏“移动支付”“高铁出行”等当代中国元素，且未充分结合俄罗斯国情进行适应性改编。由于中俄价值观、思维方式存在差异，现有教材对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的关注度不足，易造成理解障碍，加之部分编写者自身能力局限，一些本土教材存在编写错误，且多数教材出版发行量小、同质化严重、使用率低。此外，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滞后，缺乏相关线上平台支持，更关键的是缺乏小学至大学一体化教材体系，中小学与大学教材在知识梯度、能力进阶上衔接不畅，导致学生学习出现知识断层。

俄罗斯中文教育的教学方法仍存在体系单一、创新性不足的问题，现代智能技术与传统教学法融合失衡，汉语教学专业化细分不够，数字化在线教学转型缓慢。尽管部分高校进行了少量创新探索，但整体而言，其教学方法相对传统，与欧美国家存在差距，仍以语法翻译法为主，缺乏互动沉浸式体验，照本宣科的模式已无法满足新一代学习者的需求。受多种因素制约，教学方法未能充分适配现代学习需求，在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化教学细分等方面进展迟缓，难以实现传统教学与现代教育理念的有效结合。

6.2 发展对策及未来展望

针对上述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构建全学段顶层设计与跨部门协同机制。由联邦教育

部牵头，联合外交部、经贸部等成立中文教育专项工作组，明确各部门在人才培养、资源供给、政策落地中的职责边界，制定覆盖小学至大学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强化联邦政策与地方执行的衔接，建立政策实施跟踪评估机制以保障连贯性与长效性。针对教材本土化、低龄师资培养、偏远地区资源供给等核心痛点，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将“3+1”培养模式等地方创新举措纳入全国推广规范，形成可复制的示范体系。

优化财政投入结构与分配机制。设立中文教育独立专项预算，提高其在综合外语教育经费中的分配优先级，结合中俄经贸合作人才需求动态调整投入额度，平衡与传统外语的资金配置。建立财政资源地区均衡分配机制，通过联邦财政转移支付向阿穆尔州等远东边疆地区倾斜，补足偏远地区高校汉语教育拨款缺口，扩大复合型人才培养规模。调整支出结构，减少短期项目与硬件投入占比，增加对师资培训、本土化教材开发、教学研究等可持续领域的支持，同时拓宽本土财政来源渠道，降低对国际合作资源的依赖，提升财政支撑的稳定性与独立性。

搭建中小学与大学一体化衔接体系。建立基于汉语水平分层的入学评估机制，为大学新生制定个性化基础补修方案，避免“一刀切”教学。统一设计全学段课程梯度与教学目标，中小学强化语法、汉字书写等核心基础能力培养并渗透学术思维启蒙，大学衔接基础知识开展进阶教学，形成“基础积累-能力过渡-专业提升”的递进体系。推动学段间教学与评价协同，中小学借鉴大学自主探究式教学逻辑，大学兼顾新生适应特点优化教学节奏，建立统一的学习成果评价指标体系。搭建师资交流平台，通过联合教研、互派等方式共享经验，推动教材与教辅资源的学段贯通。

完善教学大纲与考试标准统一规范。制定覆盖小学至大学的一体化汉语教学大纲，明确各学段知识要点、能力目标与进阶路径，化解本土大纲与国家统考、HSK 标准的适配矛盾，实现教学目标与评价导向的一致性。建立考试标准协同机制，推动国家统考与 HSK 的题型、评价维度互认，将高校入学要求纳入中学毕业考试体系，取消重复入学测试，同时规范校内考试命题标准，建立统一的评价结果认证机制。加快与《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等国际规范的对接，形成“本土适配+国际通用”的双重标准体系，通过联邦教育督导与区域教研联盟建设，缩小地区、校际间的标准执行差异，保障教育质量均衡。

加快教师资源优化。通过“本土培养+国际引进”双路径扩大师资供给：在师范院校增设中文教育专业、扩大招生规模，与中俄高校合作开展“2+2”联合培养项目；简化中文母语者教师资格认证流程，引进优秀教师支援偏远地区与低龄阶段教学，建立师资流动激励机制，鼓励核心城市教师向非核心地区轮岗。构建分层分类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学段教师需求，开展语言能力、教学法创新、跨文化交际教学等专项培训，邀请中俄资深教师联合授课；建立“高校-中

小学”师资帮扶结对机制,完善教师认证与考核体系,将教学创新能力、跨文化教学成效纳入评价指标,推动教师专业能力持续提升。

推进教材资源完善。推进教材本土化与多样化建设,成立中俄联合教材编写委员会,结合俄罗斯文化语境、教学大纲与考试标准,开发覆盖初高级、通用型与经贸、科技等专业型的本土化教材,补充当代中国元素与跨文化交际案例,修正现有教材语言错误。建立教材质量审核机制,筛选优质教材纳入推荐目录,避免同质化与低利用率问题。强化教材学段贯通与数字化转型,构建“小学-中学-大学”一体化教材体系,统一知识梯度与能力进阶逻辑以消除学习断层;加大数字化教辅资源研发投入,搭建集电子课件、教学示范课、互动练习于一体的在线资源平台,支持多媒体教学场景应用,提升教材适配性与实用性。

推动教学方法革新。突破传统语法翻译法局限,推广情境教学法、项目式学习、跨文化交际实训等互动式教学模式,结合中俄合作实际场景设计教学任务,激发学生主动性。鼓励教师结合学段特点创新教学逻辑,中小学侧重兴趣引导与基础夯实,大学强化学术探究与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促进现代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加快数字化转型,推广智能教学平台、语言学习APP等工具,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加强教学方法专业化细分,针对日常交际、学术研究、职业应用等不同学习目标设计差异化方案,建立教学方法交流平台,推广优秀案例与创新实践经验。

总之,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深化与“中俄教育年”背景下,俄罗斯中文教育将迎来发展机遇,朝着规范化、均衡化、本土与国际化融合方向推进。政策层面,将完善顶层设计,推进2026年中文必修课试点,构建跨部门协同机制,优化财政投入并设立专项预算。体系发展上,将改善区域不均衡,补足远东及内陆资源,推动职业中文教育成为增长极,深化“中文+专业”模式,依托理工高校实现向战略人才培养的转型。资源建设方面,将健全本土师资队伍,加快教材数字化与学段贯通,推动本土考试与HSK标准对接。中俄双方还将深化高校联盟、联合培养等协作,升级孔子学院平台作用,使其成为中俄人文交流纽带,为多领域务实合作培育复合型人才,助力两国战略协作关系持续发展。

7 结语

本研究以俄罗斯中文教育为对象,系统梳理其研究现状与问题,通过历史分期厘清其从帝俄汉学奠基、苏联曲折发展到当代多元转型的演进脉络,揭示各阶段特征与规律。研究剖析中文纳入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阐释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及补充教育的特点与区域差异,通

过国际比较凸显其“强国家依附性”特征。同时从师资、教材、考试、社会宣传四个维度考察资源建设现状,指出政策财政、学段衔接、标准规范、“三教”建设等方面的结构性短板,并提出顶层设计、经费投入、学段衔接、标准完善、资源优化等对策。本研究弥补了现有研究系统性不足、学段衔接薄弱的缺陷,构建完整研究框架,丰富区域国别中文教育理论成果,为俄罗斯中文教育高质量发展及中俄教育合作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引,兼具理论与应用价值。受时间与资料限制,研究在部分问题分析、最新动态及深层机制探讨上尚存不足,未来可从区域差异、数字技术、习得规律等方向深化研究。

参考文献

- [1] 韩丽君,牟岱.孔子学院文化传播的困境与应对——以俄罗斯大学的孔子学院为例[J].人民论坛,2016,(11):253-255.
- [2] 李宝贵,于芳.俄罗斯汉语传播与中俄经贸合作相关性研究[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47(03):134-142.
- [3] 李丹宁.对外汉语教育与俄汉跨文化交际人才培养[J].继续教育研究,2018,(05):113-119.
- [4] 李敬欢,李睿.俄罗斯本土中文教学资源建设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1,32(06):157-165.
- [5] 李敬欢.俄罗斯中文教育研究动态与展望[J].民族教育研究,2023,34(06):164-171.
- [6] 刘家宁,李宝贵.中文纳入俄罗斯国民教育体系的现状、动因、挑战与对策[J].语言教育,2022,10(01):106-120.
- [7] 柳若梅.独树一帜的俄罗斯汉学[J].中国文化研究,2003,(02):135-142.
- [8] 卢春月.“一带一路”背景下中俄人文合作的现状与发展对策研究——以中国东北与俄罗斯远东为例[J].黑河学院学报,2020,11(09):5-8.
- [9] 汪磊.俄罗斯汉语教育现状与发展趋势[J].西伯利亚研究,2020,47(01):87-95+120.
- [10] 王凤英.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小学汉语教育发展研究[J].继续教育研究,2019,(06):109-112.
- [11] С. Г. Цыбенкова, Я. С. Самошкина. К Проблеме Развития Межкультурной Компетентности Иностранцев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й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J]. Вестник Буря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Личность. Общество, 2018 (3-4) :137-141.
- [12] Т.Л.Гурулева. Совместны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е программы России и Китая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реализации[J].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18 (12) : 93-103.
- [13] Т.Л.Гурулева.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роблемы Разработки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Ресурсов по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в Высшей Школе[J]. Высшее Образование в России, 2018(5) :50-58.